

求言若渴 從善如流

陶百川

——與蔣經國先生最後晤談的回憶和感想

「人之聿亡，邦國殄瘁」。所幸典型尚在，繼起有人。

今天略學經國先生的嘉言潛德，以資共勉！

戰時相識患難之交

我認識蔣總統經國先生，早在民國卅二年，時當中日戰爭，地在陪都重慶。那時他在江西擔任行政督察專員，因去重慶開會，我們乃得會晤。

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我回上海，他在南京供職，有時因公去上海，後又在上海督導財經改革，我們間或晤談。但談得較多而相知較深者，則在他擔任國防部長任內。

我應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以後，十餘年來，我既顧且問，有思有感，自更常向他和政府建言，或補闕拾遺，或正偏救弊。他虛懷若谷，能受盡言。

而且在最初幾年中，他與我晤談時，祇有我們兩人在座，隔著茶几對話，無人旁聽，所以我少有顧忌，常能暢所欲言，即使對極敏感的問題，我們也幾乎無所不談。

撤消監管意義非凡

我最後一次晉謁經國先生，是在民國七十五年夏天，預定時間本是半小時，可是竟談了一點零五分。他知道我不久以前曾有歐美之行，所以就問我美國僑胞對我政府的向背。

我說，從台灣去的人雖有主張台獨的，但為數不會很多。我以幾年前美國政府舉辦人口調查的結果作論據，其中聲明原籍台灣而非中國的，我記得是二萬餘人，他們應可認為有台獨的傾向，但全體華僑人數應在一百萬人左右。我強調只要我們政府大力改革，更求進步，他們都會萬眾歸心。

於是我想起了我與經國先生共同處理彭明敏公子獲准赴美留學的故事，事隔多年，現在我還是第一次透露。我記不得那一年我從美國回台看到經國先生時，對他陳說，彭先生不是那種主張暴力推翻政府的台獨，政府不應敵視，可是

他的兒子大學畢業，要想留學而不能出境，他家門前仍有汽車日夜監視，不知有何必要。

十餘日後，張秘書長（寶樹）問我彭子已出國否？我說不知。張秘書長告訴我：總統問起，並說他已通知有關方面撤消對彭家的一切監管，要我通知彭子可以出國。我向康寧祥先生問得彭府電話，轉知彭太太，她最初不信，旋即驚喜。幾天後她來我家道謝，說門前汽車和人都已撤走，警備總部人員並約彭公子吃飯，爲他餞行。

後來彭先生也來函道謝，我在覆信中希望彭府悲劇迅速落幕，並望大家努力使國家層面的更大的悲劇也能早日收場；我相信那是經國先生的大願。但他沒有作覆。

尊重自由美於先賢

在那最後一次晤談中，經國先生從海外台灣人對政府的態度，談到他對省籍問題的感受，他很誠懇地指出，他對省籍毫無成見。他舉例說，他身邊的衛士是本省人，他家中的護士是本省人，（我可以再加一項，他的政治繼承人副總統也是本省人）可是，他說，有些本省青年全不了解他的苦心孤詣而仍大肆攻訐，甚至及於他的先人和家屬。但他說他不恨他們，因爲他們不了解，且有誤會。他說：「陶先生，你要開導開導他們！」

那時中央黨部和司法界有人提議要在刑法中增訂一條「謾誣總統者有罪」，而且主張應該由國家提起公訴，不必由總統自己出面。他們指出，我們現行法律規定，對友邦元首的謾誣，可由國家檢察官提起訴訟，而對於自己的總統，却沒有優待的規定，所以要求把適用於外國總統的規定，也適用於我們國家的總統。但後來我却聽說，蔣總統反對這種作爲。他說，總統沒有特權，不要增加。我覺得非常欽佩，還特別問了中央黨部馬樹禮秘書長，馬秘書長告訴我，總統曾告訴行政院，不要在修訂法律時加入那一條。

後來我在一篇文章「四位偉人的故事」中，以他與美國三位開國元勳華盛頓總統、傑佛遜總統以及漢彌爾頓部長維護言論新聞自由的精神作比較，認爲經國先生比他們更了不起。

政黨政治功虧一簣

那時他已要中央常會組織十二人小組研究政治革新的五大議題，所以我也向他提供一些意見，他也有所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兩項，乃是政黨政治和國家統一。

我從談話中體會，經國先生對政黨政治不很樂觀，但認爲那是大勢所趨，所以主張因勢利導，循序漸進，先從黨外公政會做起，在三、四年內，如行之有效，就制定政黨法，實施政黨政治。

本這了解，所以後來我和胡佛、楊國樞和李鴻禧三位教授從事溝通中介時，在第一次「三邊會談」中就主張公政會可以設立，在完成立案手續後可在各縣市設立分會，從事政治活動。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修改人民團體組織法，增訂政治團體，可逕稱爲政黨，享受一般民主國家政黨應享的權利並盡其義務。

第三步，大約在民國七十九年，政府制訂政黨法，完成政黨政治。

這個構想，因為出自經國先生，原能順利進行，如期完成。可惜黨外拒絕協調，在高度保密中，連我們擔任中介的四人，也毫無所知，突然於那年（七十五年）九月廿八日宣佈成立民進黨。而因先天不足，復因後天失調，民進黨的前途迄今尚未可樂觀，政黨政治遙不可及。經國先生地下有知，應有餘憾吧。

共產主義必須反對

此外，在那次晤談中，我也提到我們的大陸政策，我一向認為「和為貴」。對經國先生從前幾次文告和談話中，一直把「中共」叫做「共匪」，我曾向他進言，以期以為不可，可喜他也接受。

在最後那次晤談中，我批評了「三不三拒」。我說，那雖是無可奈何的「免戰牌」，但現在「形勢逼人」，而「形勢比人強」，我們不能以此制勝，甚至也不可能以此退敵，而因國內人心思變，政府當局必須對它善為應付、駕馭和利導。

我說，在三不中，「不通航」尚有必要，「不接觸」恐不可能，而「不妥協」則寸步難行，我們必須在心態上善為調整。至於三拒，我說，通郵和通商有何不可，但通航則可能妨害國家安全，尚須觀望一下。

經國先生隨即指出：「有幾個『不』並不重要，我們不僅有三不，也有五不。最重要的，乃是必須反對共產主義，它是禍根，不可妥協」。務實務本，執簡取繁，旨哉言乎！

「人之事亡，邦國殄瘁」。所幸典型尚在，繼起有人，今天我更略舉經國先生的嘉言潛德，以資共勉，他和我們都應可以略節憂思了。（此文將與中央日報紀念蔣經國總統逝世週年特刊同時發表）

七七、一一、二二

顧維鈞其人其事

袁道豐 著

定價二九七元

本書共分十章，敘述我國近代外交長才顧維鈞博士之生平事蹟，作者根據顧氏之長篇回憶錄，譯述顧氏之童年，早年留美生活，參與巴黎和會等篇章，而作者袁道豐先生亦為我國之外交著宿，與顧氏締為忘年之交，又沾有兒女姻親關係，遂經常出入顧府，與少川先生談古論今，暢談人生，談外交、談為何當大使，以及當世風雲人物之印象等等，率皆親見親聞，現身說法，娓娓道來，倍感親切有味，凡研究顧氏生平及民國政治、外交史者不可不讀。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六二八 三一五五三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一〇二七四